

□历史学研究

明朱元璋《御制龙兴寺碑》考释

李明阳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御制龙兴寺碑》为明太祖朱元璋所撰写。在碑中,他追叙了元明嬗代之际,於皇寺兴废状况与个人身世浮沉,毫不避讳自己早年的悲惨经历、游方生涯;叙述即位后敕造大龙兴寺的经过及选派住持情况;并由建寺引申到自己的民生观、宗教观。碑刻既是元末明初重大史事的反映,也是明初佛教改革的见证,更是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理念、民本观念与宗教思想的具体表达,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关键词: 朱元璋; 碑刻; 明代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9333(2023)02-0129-08

一、碑刻介绍

龙兴寺,又称大龙兴寺,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朱元璋赐建。寺在明中都城内凤凰山阳、日精峰下,寺前身是他早年出家礼佛的於皇旧寺,龙兴寺为旧寺移址新建,自洪武十六年四月朔始建,至九月甲子竣工落成,“佛殿、法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1]2430-2431},“殿宇楼阁,规制宏丽”^{[2]卷3}。创寺时,明太祖“自为文记之”,即此《御制龙兴寺碑》。

此后寺院数罹于火,御碑多次重刻:第一次为正统五年寺燬,至天顺六年(1462)十二月“僧肇常请树碑重刻”,英宗从之,并赐藏经^{[3]6995};第二次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知府张大孝与董兵使元学、同知马协等重修寺院再刻^{[2]卷8}。据清方志:“今殿后碑亭内竖太祖《龙兴寺碑》,万历三十九年马协建。”^{[4]238}因迭遭燬废,明初碑版尺寸,已难

稽考,据《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载:“拓本高一丈,广五尺二寸,二十三行,行四十八字,字径二寸,正书。”并录全文^{[5]437-438}。天启《凤阳新书》亦有收。另有拓本流传,或据万历重刻碑拓印。

碑中,明太祖追叙了元明嬗代之际,於皇寺兴废状况与个人身世浮沉,毫不避讳自己早年的悲惨经历,及其在“庐、六、光、固、汝、颍”等地的游方生涯;叙述即位后敕造大龙兴寺的经过及选派住持情况;并由建寺引申到自己的民生观、宗教观,是明太祖治国理念及元末明初佛教发展的具体反映。

二、碑文考释

寺昔於皇,去此新建十有五里,奠方坤地,乃於皇旧寺也。

简述大龙兴寺前身於皇寺的方位。於皇旧寺位于新建的大龙兴寺西南十五里处。

收稿日期: 2022-12-23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明代江淮地区碑刻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AHSKQ2021D202)。

作者简介: 李明阳(1989-),男,安徽凤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史、安徽地方史。

寺昔於皇：据《凤阳新书》，“於皇”源于元代当地“虎乳於皇”传说^{[2]卷5}。然传说无稽，自难考信。其实寺自宋有之，在《明太祖实录》作“皇觉寺”，而《国榷》则云“於觉寺”^{[6]259}。据夏玉润先生考证，三种称谓中，“於皇寺”应是最先称谓：首先，朱元璋《皇陵碑》及本碑皆作“於皇”，他不可能将自己出家寺名记错；其次，天启《凤阳新书》之《中都形胜总图》将於皇里与二十家营标记一起，於皇里即寺旧址；再次，楚人称虎曰“於菟”，“於皇”之“於”即取“於菟”意；最后，当地人均称“於皇寺”“於王寺”，而不闻有“皇觉”“于觉”之说者^{[7]95-96}。另，本文认为，於皇寺所在“於皇堡”（或称“於皇堡”“於皇里”）作为明代凤阳县“道里”之一，可见诸记载：如明初将领、都督佥事谢彦，“世为凤阳府凤阳县於皇里人”^{[2]卷8}；又凤阳县博物馆藏元末明初人颜端玉墓志刻载，她于永乐六年（1408）“葬于於皇堡鲁山村之东原”。永乐初距元季未远，这些史料均是“於皇”说的有力佐证。

於皇旧寺：於皇寺在元季已毁兵燹，布局难考。1973年王剑英先生据方志寻访到寺基“在二十营子村南，四围高低不平的耕地中，有一块长方形的平整地，比附近耕地略高，极为明显”，“高台地东南方有一口大井，深约六丈”，“从废址和大井，也可以看出於皇寺的规模”^{[8]357}。旧寺轮廓当为宋代格局。

寺始刹之由，为因累经兵废，其焚修者不一。况前无刊石可稽，故失始刹之由。但知昔宋时，先为金所废，后亦为元所废。诸僧因兵而云水，不知何之者，其数无纪。惟一僧名宣者，亦被伤，入钟离旧城东岳庙焚修。后金亡宋终，元定天下，其宣者出城，于瓦砾中建茅宇而度弟子，以成其寺，应供是方。宣在宋末元初，作开山住持，师徒相继，传至住持僧德祝。于元至正十二年，群雄并起，寺为乱兵焚，瓦砾荆棘三十二年，朕常思之。

简述於皇寺在宋元以来兴废变迁与僧众法嗣传承情况。

昔宋时，先为金所废，后亦为元所废：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迨南宋立国，淮河流域位处宋金边界，於皇所在的濠州在“绍兴四年没于金，五年，金人弃城去。十一年复陷”，“开禧二年复陷”，州治一度移定远^{[9]16}。宋金连年战乱，江淮一带人口锐减，田庐荒芜，已如弃地。於皇寺先毁于宋金兵乱。金亡，宋蒙对峙，江淮“皆为边境”^{[10]4583}，宋理宗

淳祐元年（1241），“蒙古将察罕攻濠州，不克”^{[4]525}。蒙军岁岁南下抄略，宋军则常执行清野战术，在此期间，寺再毁战火。

钟离旧城：明代临淮县，古称“钟离”，据成化《中都志》，“临淮县旧城”，梁天监五年筑，宋建炎间改筑，“洪武元年，因旧基修砌”。其称“旧城”，乃因明太祖于该城西营建中都城，“中都新城，国朝启运，建都筑城于旧城西”^{[9]211-212}，故称临淮县城为“钟离旧城”。

东岳庙：即主奉泰山神东岳大帝的神祠，全国分布广泛。据清《临淮县志》，明及以前，该县东岳庙有三：“一在南关，《濠梁志》云：宋嘉定十四年，卢鼓槌来攻城，诣（词）[祠]祷求济，神弗许，乃纵火焚之而去。至正末，迁于城内，后因兵燹。”洪武、景泰、嘉靖间历有修建。“一在城内，正德八年，邑人迕诚、嘉靖四年寿官杨荣重建。”“一在南冈下，万历三十年间，乡许许薰等举会募建。”^{[11]331}

另据《中都志》云，临淮县“东岳行祠”有两座，一座“旧在城南三里，创于宋”，金兵攻濠，焚之，与《临淮县志》所记南关东岳庙无论地望还是毁坏经过均吻合，为同一座。另一座在城东北七十五里，地名西寨^{[9]375-376}，地望与碑中“钟离旧城东岳庙”距离太远，不符。此外，两志比较，明《中都志》未载清《临淮县志》所记在正、嘉以后位于临淮城内的东岳庙，因此其在成化《中都志》纂前，应未建。而南岗下的东岳庙，则明确建于万历。因此朱元璋言金元之际“钟离旧城东岳庙”，无论地望，还是所处年代，均与建于宋、位于南关的东岳庙高度吻合。

金亡宋终，元定天下：金天兴元年（1232），蒙军攻汴京，金哀宗完颜守绪弃城，后入蔡州。天兴二年（1233）九月，元兵“筑长垒，围蔡城”，至冬，宋、蒙联军攻蔡，次年（1234）正月，金哀宗传位末帝完颜承麟，随后联军入蔡，哀宗自缢，末帝亡，“金亡”^{[12]401-403}，金自太祖完颜阿骨打开创，历十帝，经119年，至此亡。金亡后，南宋与蒙古战争又起，绵延40余年之久。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曰“元”。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迫临安”，宋度宗赵禔之子益王赵昞、广王赵昺等逃至婺州、温州等地，五月，昞于福州“以为宋主”，建立流亡政权。是年冬，元兵入福建，“昞入海”，祥兴元年（1278），“昞殁于碭洲”，陆秀夫等又立赵昺为主，六月“徙居厓山”，次年（1279），元将“张弘

范兵至厓山”，宋军大败，陆秀夫负昃投海自尽，南宋皇室、官兵战死、投海者“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不久，张世杰“亦自溺死”^{[10]939-946}。南宋自高宗赵构开基，历九帝，经152年，至此亡。元朝统一全国。

应供是方：应供，本为佛教名词，为佛的尊称之一，即应受供养之义。其梵音又作阿罗汉，阿罗汉果为佛教声闻乘最高果位，《大正句王经》云：“是时尊者迦叶于彼城中名称普闻，而彼城中一切人民，素闻迦叶善说法要，常说种种深妙之义，已得无病常行头陀，是即应供是大阿罗汉。”“应供”代表堪受供养的圣者。碑文“应供是方”则泛称僧侣修行办道，接受民众供养之意。元代政府将“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13]4524}。禅、教、律中，“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14]340}，此外大量散处城乡、广布民间如於皇寺这样的中小型寺院，要维持香火存续，为施主亡故亲属“赶经忏”以获取报酬，既是寺院稳定的经济来源，也能满足民间宗教需求。

于元至正十二年，群雄并起：据《元史》：至正十二年（1352）春正月，竹山县起义军“陷襄阳路”，又陷荆门州；同月，红巾军起义头领徐寿辉遣丁普郎、徐明远陷汉阳、兴国府，己未，陷武昌，又陷安陆府、沔阳府、中兴路，二月陷江州、岳州，袁州等地，三月攻衡州、陷瑞州，又“陷饶州路，遂陷徽州、信州”，闰三月陷吉安路，七月“陷福安、宁德等县”，八月徐寿辉部将俞君正“复陷荆门州”，党仲达“复陷岳州。九月乙亥，俞君正复陷中兴”。此外，该年二月甲申，“邹平县马子昭为乱”；辛丑，邓州王权、张椿等部“陷澧州”；三月“方国珍复劫其党下海，入黄岩港”以拒元；四月江西临川邓忠等部“陷建昌路”；五月“丙寅，红巾周伯颜陷道州”^{[13]894-902}。而该年春，另一支红巾军头领郭子兴“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15]3679}，在於皇寺东北数十里地的濠州揭竿起义。朱元璋也在不久入其伍。至正十二年，是朱元璋脱去僧袍，参加起义，进而逐鹿群雄、推翻元室的开始。

寺为乱兵焚：据《太祖实录》，元至正十二年“二月乙亥朔，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等起兵，自称元帅，攻拔濠州，据其城守之”，“辛丑，乱兵焚皇觉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14]。而焚毁於皇寺的“乱兵”，即是据濠州的郭子兴部卒。据朱元璋后来回忆：郭子兴部陷濠城后，依城拒守，“哨惊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

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16]281}，《国史考异》亦云：“焚皇觉寺者，亦其兵也。”^{[17]4}

瓦砾荆棘三十二年：於皇寺燬于元至正十二年二月，至朱元璋称帝后的洪武十六年九月择址新建，废弃近32年之久，故云。

昔幼时，师高彬者，托身于寺四年。初栖之时，其年蝗旱，寺罢僧饭，师长弗济。彼时朕年十有七岁，方为行童五十日，于教茫然。因师弗济，且父母兄长不逾二旬，尽皆崩逝，家道零落，归无所恃，出无所怙。虽如是，亦飘然西游庐、六、光、固、汝、颍，三年后归。归方四年，天下乱，从雄倡义旅，南入滁阳，次入和阳，已而东渡大江，角立诸雄。又十四年，息群雄，即帝位，统寰宇。又十六年，天下太康，召询旧僧，在俗愿复为僧者，许之。惟昔住持德祝座下弟子善杞，去须发，应召而至京师。朕与之议，旧寺之基，去皇陵甚近，焚修不便。于是，择地是方，寺成。大臣入奏，更寺名曰“龙兴”，以善杞为开山住持。

朱元璋自述早年沙门生活、游方生涯以及濠州从军，最后削灭群雄、建立明王朝的历程。并记述即位后召询於皇旧僧，选址新建大龙兴寺的原因及其经过。

托身于寺四年：朱元璋于元至正四年（1344）九月“入皇觉寺。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给，散遣其徒，游四方。上遂西游”^{[11]3}。于是他“乃西游庐、六、光、固、汝、颍诸州，如此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方四年，天下兵乱。一日，乱兵过寺，寺焚，僧散。”^{[18]15}遂从军。他在至正四年九月乙巳入寺出家，十一月离寺云游三载。至正七年回寺，至正十二年闰三月甲戌朔“入濠城”加入义军^{[6]259、262}，略去年尾岁首，约四年。

其年蝗旱，寺罢僧饭，师长弗济：元璋《皇陵碑》有“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句互印证。饥疫交作，於皇寺住持僧高彬封锁寺仓，元璋遂外出化缘，以度凶年。

彼时朕年十有七岁：据《实录》：朱元璋出生于“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即公元1328年，至至正四年（1344）计17年，他足龄16，虚龄17。

父母兄长不逾二旬，尽皆崩逝：据《实录》，元至正四年，“四方旱蝗，民饥，疾病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

已太后崩。上连遭三丧”^{[1]2-3}。其父亡于六日，其兄亡于九日，其母亡于二十二日，16天内，连丧三亲，十日为旬，故曰“不逾二旬”。

飘然西游庐、六、光、固、汝、颍：即云游庐州、六安、光州、固始、汝州、颍州等地。元璋云游淮西的三载，居颍州时间最长，“当时明太祖足迹遍淮渚，而居颍为多”^{[19] 672}，因此即位后，对颍州地区寺院也很关注，如颍上宿缘寺，又称古南照寺，他曾于此留食，即位后为报达恩情，于“洪武二十五年，差内官梁丙进创建，二十六年，敕赐额‘宿缘’”^{[9]370}，另又“赐钦录一通，铜钟一口，鼓一面，铜云板一面，田一千顷”^{[20]118}。

天下乱：朱元璋对元纲解纽、群雄并起、天下鼎沸有切身体会，他称帝后，站在封建统治阶层立场上，曾说：“岁在壬辰，纪年至正十二，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16]281}而《明史》则对当时各支反元力量有较清晰梳理：“当是时，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颍，徐寿辉僭帝号起蕲，李二、彭大、赵均用起徐，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众。天下大乱。”^{[15]1-2}

从雄倡义旅：朱元璋《皇陵碑》对其入濠州城，主动参加郭子兴等的红巾军有清晰描述：“住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非？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即起趋降而附城，几被无知而创。少顷获释，身体安康。……”起义军先据濠州，军中友人寄来书信，招其同来参军。但书信来时，消息泄露，知者欲揭其事，元璋无奈，祷卜决之，以定去留，结果逃、守皆不吉，参军或是唯一出路，遂从军。

南入滁阳：滁阳即今安徽省滁州市，因位于滁水之北，故名。朱元璋入伍后，感义军头领间斗争复杂，“无足与共事”，遂“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后得李善长，“遂与俱攻滁州，下之”^{[15]2-3}。在元璋“将取滁州”时，“率数骑前行”，部将花云随从，“猝遇贼数千，云举铍翼太祖，拔剑跃马冲阵而进。贼惊曰：‘此黑将军勇甚，不可当其锋。’

兵至，遂克滁州。”^{[15]7408-7409}朱元璋“入滁阳，葺城以守之”^{[16]282}。

次入和阳：和阳，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因县南有历水，古曰历阳，又北齐、南梁于此议和，遂改和州，后称和阳。据滁后，子兴用元璋计，以张天祐、耿再成等计取和州，与元兵战，“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乱，遇举火，辄灭之。城北门旧用木栅，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烧门欲入。天祐等复以石塞其门，遂据其城也。”不久，朱元璋“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骁勇数十人径进，暮至和阳，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据之，使人呼天祐，天祐等至，左右举火。上免胄示之，遂入。……”^{[1]19-21}

东渡大江，角立诸雄：此句可与朱元璋《纪梦》：“乙未夏六月，亲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业，集兵十万，坚守江左，秣马厉兵。后三年，发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东平吴越”互证^{[16]283}。故依《纪梦》时间顺序略加考述：采石江与姑孰俱在今安徽省当涂县，朱元璋渡采石在至正十五年六月乙卯，“乘风引帆，直达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溃。缘江诸垒悉附”，“遂乘胜拔太平”。“丙申”为至正十六年（1356），建业即今南京市，元为集庆路。朱元璋在该年三月“癸未，进攻集庆，擒兆先，……。庚寅，再败元兵于蒋山。元御史大夫福寿，力战死之，蛮子海牙遁归张士诚，康茂才降。太祖入城，……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后三年，发兵四征”是指朱元璋集团在至正十六年据集庆后，至至正十九年（1359）间，他先后遣将或自率军克镇江、广德、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建德路、婺州、诸暨、衢州、处州等地，“次第略定江表”的军事征伐。

西定湖湘，东平吴越：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秋至二十七年（1367）间，朱元璋攻灭陈友谅、张士诚等的战争。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弑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地”，故略称其据地曰“湖湘”。至正二十三年夏四月，“友谅大举兵围洪都”，“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双方几番激战，八月“友谅中流矢死”，“冬十月壬寅，围武昌，分徇湖北诸路，皆下”。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亲征武昌，友谅子“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至二十五年（1365）春之前，徐达、常遇春次第平定湖湘。该年“冬十月戊戌，讨张士诚。是时，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故称“吴越”。朱元璋先遣徐、常等将平淮东等地，二

十六年(1366)秋八月辛亥,复“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二十七年九月“辛巳,徐达克平江,执士诚,吴地平”^{[15]4-14}。

去皇陵甚近,焚修不便:於皇寺位于朱元璋从戎前所居的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亦称“二十营子”)正南、洪武中扩建的皇陵外城北墙之北,“二十营子南150米土城埂北”^{[21]412}。可见三者距离很近。

“焚修不便”原因,首先,於皇寺近迫皇陵外城西角门,重建后,将阻隔在西角门及其迤东的外城正门——正红门前;其次,如原址重建,作为国家大寺,会僧团云集,香客纷沓,与皇家陵寝所要求的周围静穆肃敛的气氛不符;最后,皇陵周围广大区域,在明代“凡附近四围山场地土,累朝以来,例有重禁,不许军民砍伐树株,掘取土石,开凿窑井”,甚至“近陵处所,不许置设油榨,恐有震惊”。在明代,凤阳被视作肇基之地,皇陵更是“宗社万年基本”^{[22]2133}。如上因素,或是朱元璋移址重建寺院的相关考虑。

是时,诸僧经兵日久,失传授,怠记问。况平昔应供之仪,相传讹谬,特召仪真地藏寺闍黎文彬者讲其所以。文彬深通显密之教,特敕翰林与是僧将平日繁紊之词尽行删去,定真析伪,以成科仪,越两月而成编。时僧甚少,江东诸幼僧闻文彬奉敕官龙兴寺,愿为座下弟子者四十有畸。于洪武十六年秋八月,善祀授显密法师,文彬授善世法师。会集诸方愿从焚修者,大阐瑜伽显密之教。

概述元末明初僧团状况与明太祖朱元璋对经忏佛事的整定,及其后对大龙兴寺住持的委任。

是时,诸僧经兵日久,失传授,怠记问:因元季社会动荡,一度导致汉传佛教丛林衰微,寺院毁废,导致佛教科仪轨范因传授无方,而湮没无闻,也加剧了僧团素质的滑坡。朱元璋曾就此而论:“迩来学佛者唯饱食优游,沉霾岁月而已,如《金刚》《楞伽》诸经,皆摄心之要典,何不研究其义?”^{[23]136}故在洪武十年,命名僧宗泐等“笺释《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御制序文,颁行天下”^{[24]卷28}。“失传授,怠记问”也成了朱元璋对元末明初以来普通僧侣佛学素养的大致映象。

应供之仪:即经忏科仪,在这里特指明初经朱元璋亲自过问,编定而成的瑜伽教科仪轨范。瑜伽教是佛教密宗重要内容,朱元璋曾说:“其瑜伽法事,实本内外部真言,若人信受奉行,设施供养,

广布斋修演,念瑜伽秘密真经,则能济鬼以脱愆,饫饥虚而足绥,所以信男信女敬之,以申慎终追远之道,为此也。”^{[25]卷5}他特别重视瑜伽教团建设,洪武十六年,在厘定仪轨并颁行全国后,洪武二十四年(1391)于《申明佛教榜册》重申:“显密之教,轨范科仪,务遵洪武十六年颁降格式”,“此令一出,务谨遵,毋增减,为词讹舛紊乱”,违者“罪及首僧及习讹谬者”。为什么朱元璋对此如此重视呢?他曾说:“若瑜伽者,亦于见佛刹处,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是方,足孝子顺孙报祖父母劬劳之恩。以世俗之说,斯教可以训世。以天下之说,其佛之教,阴翊王度可也。”^{[23]60}他冀以此来发挥“攸叙彝伦,训导世民,推崇孝道,表树风教”的作用,进而“建构儒家经世的价值系统,乃至最终重构封建基层伦常秩序”^{[25]260}。这与下文云大龙兴寺未建、瑜伽法事未规范时,“其应供是方者无有,失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句互为呼应。

闍黎:即“阿闍黎”省称,即佛教中教授弟子佛学与规范弟子戒行的轨范师,据《楞严经宝镜疏》:“阿闍黎,此名轨范师,共有五种。”分别为:出家阿闍黎、教授阿闍黎、羯磨阿闍黎、依止阿闍黎、教读阿闍黎。后亦泛称高僧、和尚等。

文彬:曾为仪真地藏禅寺主僧,洪武十三年敕建地藏禅寺,“赐主僧号曰文彬,岁以昆山卫粮属寺所需”^[26]。十六年龙兴寺成,为开山住持之一。

显密之教:即显教与密教。按照佛教说法,一般将应身佛释迦牟尼佛的开示说法曰“显教”;而将自称受法身大日如来秘传、唐时传入中土“具高度系统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其特征”的佛教密宗,称为密教^{[27]55-56}。朱元璋曾对显、密教仪轨有区分描述:“其所演唱者,除内外部真言难以字译,仍依西夷之语,其中最密者,惟是所以曰密。其余番译经及道场内接续词,情恳切交章,天人鬼神咸可闻知者,此其所以曰显。”^{[23]61}

特敕翰林与是僧将平日繁紊之词尽行删去,定真析伪,以成科仪,越两月而成编:笔者曾于《明洪武朝瑜伽教僧规范化历程及其原因探究》^[28]一文考证洪武十六年凤阳大龙兴寺的营建与当时瑜伽法事规范的关系。从洪武十六年四月初一大龙兴寺开工,至五月二十一日明太祖降旨僧录司:“即今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较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申请之用。”^{[23]53-54}约为两月左右,恰与翰林学士与文彬整

定科仪“越两月而成编”的时间区间大致吻合，可见在“文彬与翰林院共同厘定成文的龙兴寺科仪的同时，也一并成就了日后有明一代的瑜伽教法”^{[28]21}。

是寺之建，非为求佛积福而建，止因幼托身于寺四年，寺因兵废，其应供是方者无有，失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因此立刹之意，留心岁久，数欲为之，恐伤民资。若将民资建寺求佛，福从何来？盖民资劳于筋骨，力为之而养父母、畜妻子，岂帝王不劳筋骨以施而求于佛仙者乎？若以是而云，无乃佛仙不可求乎？不然，佛之善，仙之化，世无上者，安有不可求之者乎？所以民供朝廷者，为求安也。朝廷所以积仓廩者，为报功赏善，以安天下也。故不敢不谨出纳以应上帝，岂肯恣意而糜费焉？因非帝王已劳而成资，资乃民力也，故不敢轻用。由是不遂建刹之意。洪武初，欲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后罢建宫室，名材为积木，因而建焉。

简述大龙兴寺创建的原因，及其建筑用料来源，并藉大龙兴寺之建，朱元璋阐述了自己的帝王布施观与民生观。

若将民资建寺求佛，福从何来：明太祖在碑中认为，民众劳累筋骨，辛勤劳作以赡养父母、抚育妻子，帝王劳费民资为自己建寺祈福，岂可行乎？因为“民供朝廷者，为求安也。朝廷所以积仓廩者，为报功赏善，以安天下也”，因此他“不敢不谨出纳以应上帝，岂肯恣意而糜费焉？”因为建寺所耗种种，皆非帝王“已劳而成资”，所费者“乃民力也，故不敢轻用”。朱元璋起于垄亩，发身寒素，又承元季之乱，百废待兴，故于民力颇为珍惜。类似思想在其相关诰文中亦有体现。如《户部尚书诰（侍郎同）》云：“昔君天下者，首建仓廩府库，于斯建者，备精粮，藏金帛，以待禄给庶职者也”，“古称‘天子富有四海’”，然“斯言似理而实阿”，因为“所以民为命而供君，君为民而集给，此所以道德也”。“所以奸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动以富为首言，则君悦富而妄费，不问民瘼之艰辛。若贤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艰辛，当敷奏府库之储集，乃曰：‘民脂民膏，若妄费则道德亏矣。’若奏以艰难，谨以出纳，则府库仓廩有余，庶职禄备而军足食，民无横科，则国之常经定、大道张，君德美矣。”^{[16]63}这些言行，都集中反映了元璋的民本思想，是其体恤民情、爱惜民力的体现。

佛之善，仙之化，世无上者：明太祖注意发挥

佛道二教训世功能，以期扶翼纲常教化，维护明王朝的政权巩固。因此他对佛道二教常加褒颂，尤其对佛教的称扬，常见诸文章，如“佛之为教也，善其大也，溥被生死”^{[2]3}（《谕钟山僧》）；“天下大道，惟善无上。其善无上者，释迦是也。……其为慈也大，其为悲也深，可为无上者欤”^{[2]2}（《建昌僧官敕》）；“噫！佛善无上”^{[2]95}（《灵谷寺记》）；“释迦之为道也，惟心善世”^{[2]19}（《佛教利济说》）。在高度肯定佛教有利于当时社会教化的作用时，也对历代竭民膏髓，建寺斋僧，佞佛道以徼福的帝王多有厌恶不屑，“周之穆王，汉之武帝，唐之玄宗，萧梁武帝，元魏主焘，李后主，宋徽宗。此数帝废国怠政，惟萧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杀身，皆由妄想飞升及入佛天之地”，“如为国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若妄想贪求，会反致“废国怠政”^{[2]23}。他甚至在《游新庵记》中设计了和庵僧的对话，以表达自己有异于佞佛帝王的佛教布施观：他游幸钟山，灵泉旁有颓庵，“有僧求布施于朕，以崇建之”，“欲以庵为朕增福”，朱元璋说：“彼虽有营造之机，朕安有己财于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朱元璋说：“不然。国之富，乃民之财，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己物，乃农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尔，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国王、大臣。”元璋曰：“当哉！所以付之者，国令无有敢谤，听化流行，非王、臣则不可。”“僧乃省而叩头。时朕不施。”^{[2]95、97}在这篇游记中，朱元璋表达了与《御制龙兴寺碑》同样宗旨，即作为君主，应惜民资、爱民力，慎出纳，不可为皇帝一己之私而营建佛寺。

虽不愿劳民以施建寺院，但明太祖朱元璋始终高度肯定佛教的训世功能。他在《释道论》中说：佛道二教，使“假处山藪之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2]12}；《三教论》云：“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2]47}。朱元璋认为佛道二教与儒家纲常教化互为表里，相辅而行，在封建国家的社会管理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教化作用。因此，御制碑中，朱元璋将“佛之善，仙之化，世无上者”的认识与“是寺之建，非为求佛积福而建”相呼应，并过渡到大龙兴寺之建目的，是其发挥佛教训世化俗的政治需要而建的。

洪武初，欲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洪武二年（1369）九月癸卯，明太祖朱元璋“诏以临濠为中都”，“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1]881}，作为

未来首都。“山”即为万岁山，中都皇城在“万岁山南，有四门，曰午门、玄武、东华、西华。洪武三年建宫殿、立宗庙、大社于城内，并置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于午门东西。”^{[9]211-212}

后罢建宫室：洪武八年（1375）四月辛卯，明太祖朱元璋“幸中都。丁巳，至自中都”^{[15]30}。他此行中都，意在查验中都工程营建进展，本为“验功赏劳”，期间却意外发生工匠“厌镇”事件。“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经薛祥奏求，“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15]3973}。事发后，相关工匠被诛。四月甲辰，明太祖于“中都祭告天地于圜丘”^{[1]1681}，他在祭文中说：营建中都，“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功将完成，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1]399}。他于四月丁巳，回京当日即以“劳费”为由“诏罢中都役作”^{[1]1685}。

名材为积木，因而建焉：据《中都志》，大龙兴寺为“撤中都宫室名材建”^{[9]358}。另据《凤阳新书》，中都宫阙中，“兴福宫，在大内之正中。其余殿宇，惟基址尚存，宫材、木植、陶冶，洪武十六年撤出，修建龙兴寺”^{[2]卷3}。因此用以营建龙兴寺的“积木”，不仅有未及使用的建筑材料，也有临时拆撤的宫室殿宇。

今也寺成，佛地已完。自建之后，凡焚修者，愿祝福于被役军民，令其已往、见存者获无量福于身家。是辞，每遇晨昏节令，讽经回向，必依是谕而祝，永世无穷，而僧妥焉。故敕记之。

洪武十六年，岁在癸亥，九月吉日立，中书舍人胡廷铉谨书。

阐述寺院建成后，僧众香客焚香熏修，当为被役军民祈福为念。并记建寺、立碑时间。另附书者姓名。

凡焚修者，愿祝福于被役军民，令其已往、见存者获无量福于身家：在明中都及大龙兴寺等营建中，均劳役大量军民人等。如营建中都，耗时六年，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劳力”，“每年不少于‘百万之众’”^{[8]47}。工役繁重，民怨沸腾，后来工匠“厌镇”一事，即是工匠群体反抗压迫的方式之一，事发后，不乏无辜受戮者。朱元璋在中都罢建的八年后，令于大龙兴寺中焚修者，要祝福已经亡故和见存于世的被役军民，“获无量福于身家”，既表达对

他们歉意，也是对当初营建中都这一错误决定的懊悔。

晨昏节令：即日常与节日的佛事活动。汉传佛教日常佛事活动，早在东晋时，高僧道安就制定了僧尼轨范，据《高僧传》：“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唐宋以后，禅林清规不断完善，全国寺院逐渐普遍遵行每日朝暮课诵、二时临斋等修行仪轨。明代丛林中早晚课诵已较普遍，朱元璋曾说：南京天界寺“每晨昏，则仪有向诸佛之礼，所以礼向者，则当徒步，周旋顶礼，方为启敬之道，而为修道之行也”^{[23]18}，即指此。而节日佛事活动则包括僧团布萨诵戒、浴佛法会、盂兰盆会、水陆法会、瑜伽焰口、放生法会及其祝圣普佛等。

胡廷铉：明初著名书法家，深受太祖宠幸。据载：他为“奉化人，字公惠，少学欧阳询书法，洪武初召至京师，命与詹孟举各写《千文》一本以进，上览之，廷铉书法过孟举，遂令书《皇陵碑》，遒劲可嘉，授中书舍人”⁽¹⁾。因其笔力遒劲，明初《大明皇陵之碑》《御制龙兴寺碑》，皆出其手。

结语

明太祖朱元璋《御制龙兴寺碑》虽是佛教碑刻，但作者是明王朝缔造者，中国封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碑文反映了他诸多的治国理念、执政思想与宗教态度。首先，《龙兴寺碑》如实刻载了他早年颠沛流离的凄寒经历、中年栉风沐雨的征战岁月，人生的曲折坎坷、失意得志，朱元璋均备尝亲历，这一部分内容，早在此前《大明皇陵之碑》中就已刻述，《皇陵碑》言，之所以要“特述艰难”，实因要向将来嗣君臣民们，讲述往日创业之艰辛，“为后世子孙戒”，以“明昌运”，并藉碑石不朽，“俾世代见之”，告诫他们打江山之不易，要珍惜守护之理。而《龙兴寺碑》也表达了相同意涵。其次，《龙兴寺碑》如实记录了大乱甫定之际，元末明初汉传佛教寺废僧颓的状态，寺院“瓦砾荆棘”、僧团“失传授，怠记问”，应是元季兵荡之后，全国较为普遍的情形。不同于一些封建君主佞佛以利己的做法，明太祖为振扬佛教，更是为了发挥佛教“阴翊王度，化导群迷”、淑世化俗的现实功用，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通过规范经忏仪轨，使佛教道场成为表达“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的场域。由碑文可证，大龙兴寺的兴建，在儒家政治与宗教

教化的双重互动中，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龙兴寺碑》是朱元璋节俭务实、以身作则的体现，“立刹之意，留心岁久，数欲为之，恐伤民资”，大龙兴寺最后也是由中都宫阙“积木”所建，体现了他一定程度爱民惜民的民本观。其休养生息，重视民生的观念，颁之以令，行之于政，诉之以法，既有利于国库充盈，政权巩固，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此外，碑末也隐露出对营建中都的悔恨，及对“厌镇”事件中无辜丧亡匠役的歉意愧疚。以上诸多内涵，价值又出《皇陵碑》之右。综之，《御制龙兴寺碑》既是元末明初重大史事的反映，也是明初佛教改革的见证，更是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理念、民本观念与宗教思想的具体表达，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注释：

(1)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明天启刻本。

参考文献：

- [1] 胡广，胡伊，黄准，杨荣，等. 明太祖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 [2] 袁文新，柯仲炯. 凤阳新书[O]. 天启元年刻本.
- [3] 李贤，陈文，彭时，等. 明英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 [4] 谢永泰，等. 凤阳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5] 徐乃昌. 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M]//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 [6] 谈迁. 国权[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7] 夏玉润. 朱元璋与凤阳[M]. 合肥：黄山书社，2003.
- [8] 王剑英. 明中都城考[M]. 合肥：黄山书社，2021.
- [9] 柳瑛. 中都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4、33册. 上海：上海书店，1990.
- [10]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1] 魏宗衡，等. 临淮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刊本影印，1985.
- [12] 脱脱，等.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4] 韩儒林. 元朝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5]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 朱元璋. 纪梦[Z]//胡士萼，点校. 明太祖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4.
- [17] 潘怪章. 国史考异[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 邓士龙. 国朝典故[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9] 王天民，张文峙，等. 颍州志[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 [20] 许晋. 颍上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 [21] 王剑英，陈怀仁，林福江，等. 明中都研究[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 [22] 黄绾. 议凤阳府不当筑城疏[Z]//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3] 葛寅亮，何孝荣. 金陵梵刹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 [24] 释纪荫. 宗统编年[Z]//CBETA 电子佛典集成·新纂续藏经：第86册. 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4.
- [25] 李明阳. 明代中都凤阳府佛教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2019.
- [26] 清慧海，原澄，等. 天王水鉴海和尚六会录[M]//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嘉兴藏：第29册[Z]. 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4.
- [27] 萧振士. 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 [28] 李明阳. 明洪武朝瑜伽教僧规范化历程及其原因探究[J]. 五台山研究，2017(2)：19-25.

An Interpretation of Zhu Yuanzhang's Imperial Longxing Temple Tablet

LI Mingya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Anhui)

Abstract: *The Imperial Longxing Temple Tablet* was written by Zhu Yuanzhang, Emperor Taizu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tablet, he recounts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Wuhuang Temple 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his personal life during the turning of Yuan and Ming dynasty. He also does not shy away from his early tragic experiences and traveling career. It also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Dalongxing Temple and selecting abbot after enthroning the throne, and mentions his views on people and religion. The tablet not only reflect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but also witnesses the reform of Buddhism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t is also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 ruling concept, people-oriented concept and religious thought of Zhu Yuanzhang,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ary value.

Key words: Zhu Yuanzhang; tablet; Ming Dynasty